

论中国特色会计理论的涵义

中国会计教授会副会长 吴水澎
厦门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才是有中国特色会计理论这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先说什么理论?这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去理解。历来我们认为,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概念)。毛泽东说过:“真正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这句话直到目前仍然是经典性的,也适用于会计理论这个概念。问题是会计有没有理论?这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的前提。但这个问题在会计学界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长时间以来,存在着一个误区,有些人总认为会计是一种“技艺”,是一种打打算算的工作,可以通过师徒式的手把手的方式传授,会计无理论可言。这种观点在国内外都曾有过。这种观点的产生和存在,不能不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后也可能成为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会计理论征途中的障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人们为了改造、保护和恢复客观世界,就必须认识世界。会计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为了使会计符合人类的需要和目的,人类就必须认识会计。会计理论的实质就是人类在会计实践的基础上对会计的理性认识。我们曾给会计理论下了一个定义,即“在会计实践基础上,通过思维等一系列活动,所形成的关于会计的理性认识,它反过来指导会计实践。”除此之外,现实中又有一些人认为,会计是一门经济定量方法的应用科学,而方法科学无理论可言。对于这样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因为方法也是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科学;而任何科学都有其规律性。通过我们对方法的理性认识,也会形成为方法的理论,世界上很多方法学科都是属于方法理论的科学。我们肯定了会计不仅有理论,而且还必须十分重视会计理论对会计实践的指导作用。因为如果不重视会计理论的重要作用,建立有中国特色会计理论也就不是十分迫切了。对此,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去提出问题和解释问题,这个民族就是没有希望的。”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也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理论指导的党。”

当我们肯定了会计理论的存在及其重要作用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怎样较为具体地加以界定?会计理论的中国特色,概括地说就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进一步说,现在我们的最大国情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是由于我们处于这样的阶段,也就使得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形式与特点、经济体制、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国家长期经济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外汇、外贸体制,企业资本来源与资金市场,企业的规模、复杂程度与经营管理水平,对外经济交流与往来,乃至世界观、立场、观点和方法等方面,与别的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因此我们的会计及对它的认识,既有共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从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会计理论。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还可以具体地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加以阐述。

(一)从理论的内容上来看,它一般应包括理论的研究方法、理论的框架内容、基本观点,等等。而所有这些又应该是当代的、中国化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几方面,它们既有其特定的内涵,又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关于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理论内容框架、基本观点等问题,除基本观点我们已有专门的文章讨论外,其他问题将在下面有关问题中进行简要的探讨。在这里先就当代的、中国化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等问题谈些基本看法。

先从“当代的”这个问题说起。目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因此,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中“当代的”这个特性,不仅是指现在这个概念,而且还指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要求的理论。也就是说,当代的会计理论除了必须反映社会主义本质、为社会主义服务外,还应注意不能脱离当前的现实,但又必须摆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束缚和限制;相反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最终目标作为参照,审视和检验既有的会计理论,实现会计理论的更新和变革。会计理论的现代化是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而所谓“中国化的”，前面已提到过，应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符合中国实际。当前，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就存在着一种历史的必然联系，即应当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立论基础，来创建我们的会计理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中国化的，也才能指导中国会计的实践。

那么，为什么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会计理论时，应当把邓小平理论作为立论基础呢？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我国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那么，从会计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会计理论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下的会计实践所形成的。过去，在这一方面，我们曾有过深刻的教训，我们曾经把会计理论建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口号；我们也曾经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把同商品经济有联系的会计理论与方法全部斥之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并批判得“体无完肤”。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外国的月亮总是比中国的圆”，主张“全盘西化”，等等。所有这些，使我们会计理论的发展走了许多弯路，使得我们的会计理论无科学性可言，甚至是反科学的。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时，我们应对此认真地进行分析和反思。在讨论和建立我国会计模式及有关理论时，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理论，应当体现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特点和要求；必须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会计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服务。

所谓“中国化”的，这除了上面已经指出的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及符合中国的实际外，还应当理解到，如果它不同中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不能取得一定的民族形式，不能最终实现民族化，并且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那么这种理论一定是相当抽象空洞，没有力量的，也难以解决实际问题。第一任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亨利·本森在1976年荷兰会计师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说得很坦白：“从国内准则到国际准则的距离，看来似乎是短的，但存在着严重的‘鸿沟’。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偏爱他们的方法，好象他们偏爱他们国家的食物、酒和风俗习惯一样。一种更可怕的障碍是各国政府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主权，没有一个政府肯把自己有权决定的事让给别人。”这些话值得我们很好地玩味。

至于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应当是“马克思主义

的”，除了上面的论述以外，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会计理论应当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并给予理论证明。这就是我们的会计理论也应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所体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现在某些人看到别人在研究会计理论时提到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舒服，认为这是一种极“左”的思潮，对此，我们应正确地予以对待。

我们想引用胡绳同志的一段话来加以回答，尽管他说的同我们所说的并不是一回事，但其道理是相通的。胡绳同志说：“我的一个比我年轻的老朋友和另一个也曾相识的朋友宣告说，要告别革命。其意似乎一是要否定历史上一切政治革命（大概工业革命不在被否定之列），这恐怕只能表明自己的狂妄，二是要表示不赞成以后再有革命。我想，一个人发誓再不同任何革命发生关系，这只好由他。但是如果此人竟以为革命将因为他的‘告别’而不再发生，未免过于幼稚，至少与科学研究相去万里。如果此人所要告别的革命只是某种具体形式的革命，那么大声喧嚷‘告别’以哗众取宠，其见识与死抱着某种特殊形式的革命的教条主义者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如果有人说可以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会计理论问题，这只好由他，但却不能反对别人在研究会计理论时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为我们相信它是科学的。

（二）从会计理论所表现的形式来说，现在有些人认为，没有大部头著作就不能算是理论；有了著作，但没有一整套抽象的逻辑推理也不能算是理论。我们认为，这都是从形式上看问题。其实理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这方面已有人进行过概括并举过以下例子：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有大部头的著作，而且有各自的范畴和逻辑推导体系，这当然算理论；像毛泽东，他留下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而写的，同时又有系统的阐述，当然也是理论；孔子是举世闻名的大思想家，但他的理论则是另一类，像《论语》这样的著作，既不是他个人撰写的大部头专著，也没有进行系统逻辑的推导，但现在大家也认为它是理论。由此看来，会计理论从其内容到体系的建立，也不必拘泥于什么形式。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看一个理论是否有科学体系，首先要看它是否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哲学基础，或贯穿于各个理论观点的基本线索；有没有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或基本理论问题）；有没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等等。这就是会计理论的形式应该、也可以做到“百花齐放”。□